

蘇正道 著

江永禮學研究

——以《禮書綱目》為中心——

中國博士後基金第63批面上項目“《朱子家禮》與清初禮學”(2018M632514)

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的禮書編撰與禮學研究”(18BZS074)

四川省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江永《禮書綱目》與清初學術”(SC17C049)

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江永禮學研究”(18SA0211)結項成果

蘇正道 著

江永禮學研究

——以《禮書綱目》為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蘇正道著.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309-14263-1

I. ①江... II. ①蘇... III. ①江永(1681—1762)-禮儀-思想評論
②《禮書綱目》-研究 IV. ①B249.9②K89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69778 號

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
蘇正道 著
責任編輯/胡春麗

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
網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門市零售: 86-21-65642857 團體訂購: 86-21-65118853
外埠郵購: 86-21-65109143 出版部電話: 86-21-65642845
上海四維數字圖文有限公司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9.5 字數 242 千
201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263-1/B · 695
定價: 50.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蘇正道，1982年生，四川萬源人。本科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碩士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博士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專門史專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安徽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清代學術和禮學文獻。曾在《中國典籍與文化》《安徽大學學報》《中華文化論壇》《新經學》等刊物發表文章數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的禮書編撰與禮學研究”（18BZS074）。

責任編輯 胡春麗
裝幀設計 吳博聞

序

今日學界，能述“三禮”者，不啻鳳毛麟角。

先師黃壽祺教授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撰《群經要略》一書，嘗慨嘆：“近世禮學廢絕，專業者至稀。”（《群經要略自序》）又頗讚賞近儒姚仲實《史學研究法》所倡“禮爲史原”之說，並引其說云：“蓋歷代國家政治之治亂，社會風俗之厚薄，非考其所立之大經大法，無由而知。《禮》之所記，大抵皆大經大法也。”（《群經要略》卷五）可見治禮與治史密相關聯。

此書名曰《江永禮學研究》，副題“以《禮書綱目》爲中心”，其宗旨是通過探討清初著名學者江永復興禮學的學術貢獻，以考論乾嘉學術的起源及其發展演進的歷史。作者蘇生正道，2008年自蜀來閩，從我攻讀古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畢業後考取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在朱維錚教授門下專攻清代學術史，嗣獲博士學位。是篇即其博士學位論文修訂稿也。

初，蘇生之來閩，尚是二十餘歲的青年學子，淳樸而略涵執拗之氣，修業能自刻苦，踐履亦頗篤實。所爲碩士論文，即圍繞戴震學術思想展開，已打下較堅實的研究乾嘉學術的根基。今觀此書，先敘清初禮學復盛的背景，次考江永生平著述及與弟子戴震的關係，次以主要筆墨論析江永《禮書綱目》的編撰始末、考證特色、與朱子舊編之異同以及在學術史上的意義等，從而歸結出江永的學術創獲及對此後清代學術的重大影響。這種從一部專書入手，旁通細考品論對象的整體學術思想，並深入探究其對於一個時代學術的作用，無疑是成功

的研究方法。書中的獨到見解，亦復不少。如認為清初禮學考證之盛，實出時代需求，非僅學人爲避文字獄而始爲之。又如對江永學行履迹的考述，揭出其走上學術路途頗因生計所迫，不入俗套。尤其對《禮書綱目》所作論述，有考據，有比較，從宏觀結構和微觀考證上分析了江永對朱子禮學的繼承與創新，以凸顯其不可忽視的學術影響，宜稱深入透徹，不乏原創精神。

前哲有云“六經皆史”，則治經治史，誼可通貫。蘇生適值三十有六韶齡，大好年華，正當奮力進取。是書固屬成功之作，但亦需看到某些不足，若相關文獻資料的精心提煉，重點學術理論的多向升華，皆值得日後進一步思考優化。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原非一句口號，吾輩應在開拓視野、獨創新知的理念指導下，實事求是地努力爲之，其將庶幾乎？我願與蘇生共勉之。

公元二零一九年四月

夏正戊戌歲穀雨後二日

張善文寫於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序

蘇正道博士新著《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爲中心》，歷經多年的修改潤色，即將付梓面世，師友相與歡抃。我作爲其博士後研究工作的合作者，不敢以譎陋不文而推辭，故謹遵其囑，聊贅數語，忝附書首。

王國維論有清三百年學術發展史，曾指出：“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此精闢獨到之言，爲近代以來學界共識。其中，“國初之學”與“道咸以降之學”，皆以能够“學貴時效”“經世致用”而爲世人所贊譽。唯獨“乾嘉之學”，則因“窮研訓詁，遂成無用”，尤爲當代以來學界所輕視。

“乾嘉之學”又稱“乾嘉漢學”或“乾嘉樸學”，對於仍以經學爲全部學問的清代社會而言，乾嘉學術誠爲繼漢魏經學和宋明理學之後，主張“回歸原典”“以復古求解放”，對儒家傳統學術和思想文化加以整理和總結的集大成之學。它雖有時而不彰，卻歷久而不廢，這對今日中國人文學科的傳承發展，如何遠離“欺詐”“僥幸”和“偷惰”的學風建設，仍具有極爲重要的啓示和借鑒意義。清末章炳麟評判乾嘉漢學之“善”曰：“近世爲樸學者，其善三：明征定保，遠於欺詐；先難後得，遠於僥幸；習勞思善，遠於偷惰，故其學不應世尚。”民國梁啓超也稱贊樸學爲能“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誣也。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於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確，誠有足

與國學俱不朽者”。在此“宏博精確”之中，清儒江永必居其一也。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徽州婺源人)一生鍵戶授徒,“閉門潛修,未及聞達”,因“經術湛深,士林望重”,故“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時人王昶稱其“雖終老蜷伏,不見知於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群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奧。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其高弟子,名著一時者有戴震、程瑤田、金榜、鄭牧、汪肇龍、方希原、汪梧鳳等。這些學者又依傍四處經營的徽商之便,在江浙一帶傳播漢學,乾嘉時代尤以揚州為最。故儀徵劉師培自劃“揚州學派”“五代之傳”盡歸於“江氏之學”,自有其道理在,同時也證明了江慎修確乎為“皖派”乃至“揚州學派”的開創者,是清初理學轉向乾嘉漢學的關鍵人物。徐世昌《清儒學案》指出:“婺源江氏與元和惠氏同時並起,其後治漢學者皆奉為先河。婺源之學,一傳而為休寧(戴氏),再傳而為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其學派傳衍,比于惠氏為尤光大矣。”此論在章太炎、梁啟超等民國大儒的著述裏皆有同調可尋,堪稱定讞。

若翻檢民國之前的清代學術人物史料,江永無疑屬於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在當代有關清學史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江永者寥寥,與其成就和地位極不相稱。究其原因,乃畏難其學之艱深也。江氏著述,要在三域:小學、禮學、算學。如《四聲切韻表》《古韻標準》《禮書綱目》《律呂新義》《翼梅》《推步法解》等二十種,被《四庫全書》收錄竟達十六種之多,這種“上充秘閣之選”的榮耀在清儒中也屬少見。但在今日,如此三域內容,幾可歸於“絕學”,當下學者能够染指者極稀,也是自然之事。蘇正道的博士論文《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可謂是知難而上且卓有成績的一部研究江永禮學成就的佳作。如果說,江永的學術是“為往聖繼絕學”,那麼,蘇君此書則為新時代繼承和發展江氏學術的攻堅性成果。

二

清代學者對於禮學的研究熱情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說禮學的復

興是清代學術的顯著特色。僅就《四庫全書》系列和正續《皇清經解》而言，有關禮學的內容就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尤以徽州學人及其著述最為顯著。如黃生《三禮會龠》、姚際恒《三禮通論》、江永《禮書綱目》和《周禮疑義舉要》、汪紱《參讀禮志疑》和《禮記章句》、程廷祚《禮說》、戴震《考工記圖》、金榜《禮箋》、程瑤田《儀禮喪服足徵記》、凌廷堪《禮經釋例》、“績溪胡氏”之胡匡衷《周禮井田圖考》《儀禮釋官》、胡培壘《儀禮正義》等，他們不僅是清代的一流學者，而此一系列的著述也皆為不朽杰作。近世大儒對此特殊現象一致認為“吳派”精于《易》，而“皖派”深於《禮》。徽州之學成于江永、戴震，“江戴之學自《禮》入。自東原出而徽學遂大，一時學者多以治《禮》見稱”。這是值得學界認真對待和深刻反思的問題。

江永的禮樂類著作主要有《禮書綱目》《禮記訓義擇言》《儀禮釋官增注》《儀禮釋例》《深衣考誤》《鄉黨圖考》《周禮疑義舉要》《律呂新義》《律呂闡微》等，尤以《禮書綱目》為最。該書之撰，是為廣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作，江氏時年四十一歲。其自述緣起曰：“自少即求《儀禮經傳通解》，反復切究之。讀之既久，覺其中猶有搜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又觀朱子晚歲及門人書，多拳拳於禮。慶元庚申三月九日，為易簣前一日，猶作書與黃勉齋先生，以修禮書為屬，其注念於《禮經》如此。竊不自揆，更欲為之增損隱括，以卒朱子之志。是以別定規模，區為八門：一曰嘉禮，二曰賓禮，三曰凶禮，四曰吉禮，五曰軍禮，六曰通禮，七曰曲禮，八曰樂，凡百六篇，八十有五卷。又采漢唐宋諸家論禮，及朱子欲修禮書，論禮綱領者，別為首三卷。近又附入《深衣考誤》一卷、《律呂管見》二卷，總九十一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雜書者，悉有條理可考。書凡三稿，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稿始易今名為《禮書綱目》。蓋八門為總綱，而各篇則綱中之綱也。篇分章、段為目，而事之繁碎者又有細目，則目中之目也。卷帙既多，但能錄古注與釋文，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此乃江氏撰著《禮書綱目》境況之大略也。該書宗法朱熹而又有所創新發展，即以《儀禮》為

經，《周禮》《禮記》為傳，旁及經史百家，通過對《儀禮經傳通解》的增刪隱括，改變了朱子禮書“內聖外王”體系，而回歸《周官》“五禮”系統，自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為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厘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為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為式”。江永鑒於朱子及門人禮學著述的“搜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而以新時代漢學家的學術責任與求是精神，“參考群經，洞悉條理，實多能補所未及”，終以“厘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乾隆元年，高宗詔修《三禮義疏》，朝廷數次下文，檄取江氏《禮書綱目》，以備“三禮館”參考之用。書生為學，一生能有此“館選”之遇，亦可謂榮幸之至矣。今正道君選擇江氏《禮書綱目》研究為切入點，並由此而推展至清代禮學思想的研究，確乎展開了一次艱難而有意義的學術旅程。

三

江永是清代學術史上介於“清初三大家”與“乾嘉學派”的惠棟、戴震和錢大昕之間的重要人物。其學在考索音訓，追溯典章，宗朱子，通經學，貫西學，舉凡古今制度、天文輿地、曆算呂律，經史義理等，無不淹博、識斷、精審。正道君選擇江永及其《禮書綱目》為研究對象，置之於清代禮學復興和乾嘉漢學形成的過程中加以考量，為探討清代前中期的學風變化和學術轉型，提供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個案典型。新著的創新點，在於作者認為江氏禮書編撰和禮學考證，不僅寓有“以古禮正今俗”的目的，而且意欲“為聖朝備一禮樂之書”，在一定程度上頗有引領官方進行禮書纂修的意圖，而並非純粹地“為考證而考證”。其次，《禮書綱目》由“窄而深”的文字校勘、文獻考證，漸次轉向律呂、曆算、音韻等精深的專題性研究，進而深入博大的禮制禮儀的探討世界。如此的治學路徑，極大地影響了後世的禮學研究，也充分體現出乾嘉考證學的歷史發展進程，突出了“皖派”學術側重文字訓詁而兼顧經史義理的“以詞通道”之法，以及“綜形名，任裁斷”的治學特色。作者努力揭示與弘揚“皖派”“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

令”的學術風格，以及“溝通漢、宋之郵”的治學目的，把江永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對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和發展也富有一定的啓示，頗富經學史和學術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正道博士是一位很有潛力的青年學者，性格內斂而處世低調，一心向學，刻苦自勵，很適合做這種枯燥而純粹的經學研究工作。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師從朱維錚、王維江先生，受到過嚴謹樸實的學術訓練，有著扎實的前期積累和敏銳的學術感知力，並對所從事的研究事業充滿感情和熱忱。兩年前，他又來到安徽大學，繼續博士後研究工作，與我合作進行明清學術及徽學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優異成績：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中國博士後基金資助，出版著作一部，發表了數篇很有分量的論文。如此可喜可賀的成績，也算是對他多年以來辛勤汗水的一點回報吧。

弁冕紳經之事，號為難治，其學非短時所能盡通。作為投身書卷的學者，已知為學之甘苦，也應有人生之追求，所謂書田菽粟饒真味，萬古不磨自在心。今正道君的新書出版在即，謹寄數語，權當同調相惜。希望蘇君能以此新著為學術征程之起點，“日新又新，止於至善”，是所望也。

時歲次己亥暮春之初，徐道彬謹識於安徽大學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章 清代禮學研究的復盛和禮書編撰的興起	23
第二章 江永生平學行考述	47
第三章 江永與戴震	66
第四章 江永著述考略	88
第五章 《禮書綱目》的編撰與刊行	108
第六章 《禮書綱目》對朱子禮書的賡續與重訂	119
第七章 《禮書綱目》與《儀禮經傳通解》的“異”與“同”	146
第八章 《禮書綱目》校勘管窺	166
第九章 《禮書綱目》的考證特色	179
第十章 《禮書綱目》的引書及其學術史意義	194
第十一章 《禮書綱目》與江永學術	208
第十二章 江永禮學研究的學術影響	229
結 論	248
江永年譜簡補	252
參考文獻	267
致 謝	287
付梓後記	290

緒論

一、選題背景

乾嘉學術以考據為特色，又名乾嘉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的中堅；同時因主張糾偏宋明理學的空疏而回歸漢代的名物訓詁，被冠以“漢學”的稱謂；由於其注重研究的樸實無華，又被稱為“樸學”^①。儘管乾嘉學術無法包含整個清代學術，此外還有清初程朱理學、清季經今文學，研究一度興盛，但流行於 18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上半葉的乾嘉學術，以考證為最大特色，是清代學術的中堅。這一地位從未動搖^②。但令人唏噓的是，相比乾嘉學術的重要地位，學界的研究只能用任重道遠來形容。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17 世紀明清鼎革，學者反思陽明心學的空疏和危害，掀起思想領域的啟動，這是一個“天崩地裂”的時代，有着“別開生面”的思想^③。19 世紀西方的人侵，民族危機深重，精英士大夫受此震蕩，各種思想此起彼伏。

① “樸學”一詞首見於《漢書》卷 88《儒林傳》，“（倪）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603 頁。

② 周予同先生說：“‘乾嘉學派’，顧名思義，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學派，但是也不盡然。這些學者，有生於康熙朝的，如王鳴盛；有卒於道光朝的，如王念孫、王引之。就他們一生的主要經歷和所代表一時學風而言，稱為‘乾嘉’，固無不妥。”周予同：《有關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朱維鈞先生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700 頁。

③ “天崩地裂”“別開生面”的提法，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3 頁。

相形之下，18 世紀的中國學者埋首故紙堆，似乎毫無生氣^①，反映在學術研究中，便是從事乾嘉學術的人員和著述相對較少，甚為不足。

儘管“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②的考據熱情，在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崇尚科學背景下獲得認可^③，也在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再獲提倡，但僅限於考據方法，而且事後看來，更是曇花一現，回光返照。在清代部分學者的眼中，18 世紀的考據學毫無思想性，是智力浪費^④。現代學人亦認同其說。朱維錚先生指出，清代學者存在學術與思想的分裂，“清代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呈現的輝煌，與它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示的沉悶，恰成反比。”^⑤新儒家學者更是在研究中繞開乾嘉學術，或者僅關注考據學者的義理之學，將其視為宋明理學的繼續^⑥。長期以來，受到民族主義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學者大多認為考據學者埋首故紙

① “中國近現代多數學者在探索和重建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險象環生的歷程時，只重視 17 世紀和 19 世紀的歷史，對於 18 世紀則有所忽略。”[美]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初版序言第 3 頁。

②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第 60 頁。

③ 盛贊乾嘉學術“科學”精神的梁啟超以為“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 35 頁。

④ 魏源以為乾嘉學者“擯為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網天下聰明智慧盡出於無用之一途”。《古微堂外集》卷 4《武進李中耆先生傳》，《魏源全集》第 13 冊，岳麓書社，2011 年，第 246 頁。包世臣言“戴震亦能從政”，章太炎比較其說，認同魏源觀點。《學隱》，《章太炎全集》第 3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61 頁。

⑤ 朱維錚：《清學史：學者與思想家》，《走出中世紀二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74 頁。朱先生繼續指出，造成這一局面是清朝分裂的文化心態導引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所致，這是解釋清代經學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經學的近代行程》，載《中國經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55 頁。

⑥ 馮友蘭以為“漢學家之義理之學，表面上雖為反道學，而實則係一部分道學之繼續發展也。”《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61 年，第 975 頁。陸寶千《清代思想史》繞開乾嘉考據學，從清初學者的經世致用，直接講到清季《公羊》研究，即使第四章《論清代經學：以考據治經之起源及其成就之限度》，亦認為“清初經學之盛，由於晚明以來之經世要求所致”。《清代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64 頁。

堆,逃避現實^①。18世紀的乾嘉考據學承繼着清初學術的余暉,吐着清季學術的養分,但研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②。其中原因衆多,包括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分野,不同時代學術標準的取徑,研究者的興趣和研究取向,等等^③。

清代阮元和王先謙先後編刻的《學海堂經解》《南菁書院經解》,共收錄清人經解著作近400種3000卷,其中大部分為乾嘉考據著述。18世紀考據學者對經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給現代文史研究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儘管遭遇到各種困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乾嘉學術的研究不斷升溫,論著數量多^④,議題深入,其中尤以“乾嘉經世之學”“乾嘉新義理學”“漢宋之爭”“清代禮學”“清代學術的派別與源流”“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績最為豐碩^⑤。具體來講,18世紀考證學的思想性得到重新審視,漢宋之爭的研究得到深化,乾嘉宋學的研究得到關照,乾嘉經史考證受到重

① 王俊義認為乾嘉漢學得不到正確評價的原因有三:一、主觀偏見和門戶之見,如江藩《漢學師承記》不列顧炎武、黃宗羲於漢學門堂,書末勉強增補。二、民族思想的影響,如魯迅《算帳》質疑乾嘉漢學的成績是否值得?三、“文革”極“左”思潮影響,認為乾嘉學者埋首故紙堆,學不足用。王俊義:《評價乾嘉學派應消除歷史成見》,《社會科學戰綫》1992年第3期,第164—168頁。

② 艾爾曼認為“18世紀晚期的中國歷史,實際上是17世紀以來政治、學術變革的延續及其發展的極致,其影響甚至播及19世紀乃至20世紀。18世紀的歷史是17世紀滿族人關到19世紀西方入侵的漫長歷史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初版序言第3頁。

③ 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分野表現在,乾嘉學術因缺乏思想性,被思想史研究摒棄,僅為學術史研究的對象。時代和學術標準,如民國時期提倡民主、科學,考據學成為關注的對象;新中國成立後受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影響,乾嘉學術被批評逃避現實。研究者興趣和取向的差異,如梁啟超和錢穆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立意不同,角度相異,結論大相徑庭。

④ 林慶彰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收錄包括“清代學術通論”“乾嘉學術通論”“四庫學”“乾嘉學者分論”等有關論著3480條,幾乎囊括20世紀乾嘉學術研究的所有成績。林慶彰主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

⑤ 雷平:《近十年來大陸乾嘉考據學研究綜述》,《學術月刊》2004年第1期,第123—128頁。周積明、雷平:《清代學術研究若干領域的新進展及其述評》,《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9—124頁。

視，文學和史學的交叉研究得到注意^①。儘管如此，在乾嘉學術的若干領域和若干議題上，仍有深掘的潛力。比如，關於乾嘉學術的起源和過程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晚明的二十多年，已開清學的先河。其下限略有爭論，一般以乾隆中葉四庫開館，成為“漢學家的大本營”為界^②，由明末清初至此的這一個半世紀的行程，便是清代學術由王學（陽明學）返歸朱學（程朱理學），最後漸至考據學的歷程。對於這一歷程的研究，即清初理學轉向乾嘉考據的過程的研究，或即乾嘉學術的淵源問題，已有相當多的著作予以專門的討論。

從乾嘉學者開始，他們心目中的漢學開山便見仁見智^③。清初學術為何卒至古典考據學獨盛，民國以來的討論主要有“外在變遷”和“內在理路”之說。“外在變遷”說以章太炎、梁啟超、侯外廬為代表，他們主張從政治、經濟制度入手，尤其注重資本主義萌芽說和文

① 其中代表性論著如下：一、乾嘉考證學思想性的研究，黃愛平：《百年來清代漢學思想性問題研究述評》，《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二、乾嘉新義理的研究，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貌》（里仁書局，1999年）、《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里仁書局，2003年）、《清代的義理學轉型》（里仁書局，2006年）。周積明：《關於乾嘉“新義理學”的通信：兼評張壽安研究員“乾嘉學術”的系列研究》，《學術月刊》2001年第4期；《〈四庫全書總目〉與乾嘉“新義理學”》，《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乾嘉時期的學統重建》，《江漢論壇》2002年第6期；陳居淵：《論乾嘉漢學的更新運動》，《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4期；《十八世紀漢學的建構與轉型》，《學術月刊》2009年第2期。三、對經世致用的研究顯示，這一思潮在乾嘉得到延續，黃愛平：《論清代乾嘉時期的經世思潮》，《中國哲學史》1997年第4期；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四、漢宋之爭研究的新進展，張循：《清代漢、宋學關係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4期。五、乾嘉宋學的研究，李帆：《清代理學史（中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六、乾嘉經學與文學的互動研究，馬積高：《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115頁。

③ 洪亮吉認為清初樸學之風由顧炎武、閻若璩首倡。《卷施閣文甲集》卷9《邵學士家傳》，《洪亮吉集》第1冊，中華書局，2001年，第192頁。江藩《漢學師承記》以閻若璩和胡渭為漢學開山，而將顧炎武和黃宗羲排除在外，僅附篇末。更多“乾嘉學者對考據學源頭的追尋”，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頁。該書論述了洪亮吉、王鳴盛、臧庸、江永、段玉裁、俞樾、皮錫瑞各自心目中的漢學開山。